

朝鮮君臣的一場讀書會： 《曝書亭集》的海東閱讀史

王思豪

[提 要] 一代巨儒朱彝尊,他的《曝書亭集》“四海爭傳”,流播海東,被東國文士廣泛閱讀並徵引。在朝鮮英祖三十二年,第二十一代君主李昉與儒臣們舉行一場讀書會,閱讀對象即是《曝書亭集》,這場讀書會被完整地記錄在《承政院日記》中。讀書會起因是《曝書亭集》記載有“建文之崩”事,聚焦點在於“思明”,在“明事不分明”的歷史語境中閱讀《曝書亭集》中的“明史”斷片。《曝書亭集》入藏弘文館,原因之一是朱彝尊為賦“善文”,其《謁孔林賦》追尋聖道,與英祖“以文擇人”的主張符契。朱彝尊閱讀海東史籍,遙望海東文獻;海東文士閱讀朱彝尊撰述,回望中原學術,二者在互望中,豐富《曝書亭集》的東亞閱讀史,彰顯朱氏的豐贍學識和巨大海外影響力。

[關鍵詞] 朱彝尊 《曝書亭集》 英祖 《謁孔林賦》 閱讀史

[中圖分類號]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51 - 08

《曝書亭集》是一代巨儒朱彝尊晚年親自刪定的文章全集,凡八十卷,分賦一卷、古今詩二十二卷(編年排列,自順治二年迄康熙四十八年)、詞七卷(《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蕃錦集》一卷)、文五十卷,又附錄散曲《葉兒樂府》一卷,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其孫朱稻孫刊刻竣工,此為《曝書亭集》最原始的刻本,世稱“康熙本”,後《四庫全書》據此抄錄。^①此集廣為傳播,清人林大椿有《讀〈曝書亭集〉》詩紀云:“頭頭第一付題評,萬卷奇書鑄盛名。元氣淋漓唐吏部,訓辭深厚魯諸生。千秋雅擅經神望,四海爭傳學士聲。水有黃河山有嶽,配公才力是天成。”^②這部“奇書”在中原享有“盛名”,比肩韓愈、鄭玄之作,故“四海爭傳”,也因此流播到了海東朝鮮。

一、導入:為什麼閱讀《曝書亭集》

朱彝尊《曝書亭集》何時傳入朝鮮,目前已不可知。但海東文士非常關注此《集》,朝鮮實學派文人李德懋(1741~1793),他的全集《青莊館全書》卷三十六至四十七為《磊磊落落書》,主要是李氏為中國明末遺民所作的傳記,其中引用書目即有列入《曝書亭集》,且在書中徵引《曝書亭集》中文獻近二十條。^③朝鮮大儒成海應(1760~1839)在他的《研經齋全集》卷三十七開示《皇明遺民傳引

用書目》，也列入《曝書亭集》。^④英祖朝名士申緯在其 1759 年所寫的《冰太極記異二十一韻》一文“丹訣傳唐銘”語下注曰“語在朱竹垞《曝書亭集》”。^⑤可見《曝書亭集》很早就已被海東文士們廣泛閱讀並徵引。

自《曝書亭集》刊刻 42 年後，朝鮮英祖三十二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十七日酉時，朝鮮王朝第二十一代君主李昉與儒臣們舉行了一場讀書會，閱讀的主要對象即是朱彝尊的《曝書亭集》。這場讀書會被完整地記錄在了《承政院日記》中，承政院是朝鮮王朝的最大機密機構，又稱喉院、代言司，是傳達王命與上奏臣下奏摺，提供意見予國王、接待中國使臣，觀察地方民政的官廳。《承政院日記》是以日記體的形式記錄朝鮮時代國王秘書機關承政院處理的各項事務，收錄接發國王的旨意、各行政機關的政務報告、國家和宮中儀禮、軍事活動與承政院自身的事務等多種內容，目前存有 3243 冊，堪稱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年代記錄，且大部分是以漢文草書所寫的手寫本，被指定為朝鮮第 303 號寶物。

那為什麼朝鮮君臣們會在這個機構裡閱讀討論起朱彝尊的《曝書亭集》呢？

這次閱讀的地點是在崇文堂。參與的儒臣有副應教元仁孫、副修撰洪淮海、左副承旨任瑋、假注書李晉圭、記事官李世演和金和澤。剛開始，英祖命令元仁孫讀自己御制的《自省編》，後議及國家大政，元仁孫說“崇獎氣節，國之大政，大明之末，有遺民不仕者，徐方是也”，引出徐枋等明末遺民不仕的話題，接著又討論了呂留良“節義”和錢謙益“出降”的問題。因錢謙益“出降”事，載之《明史》，英祖便說：“儒臣必熟《明史》矣。《宋史》則書帝顯以下，《明史》則不書弘光以下，何也？”據《宋史》本紀第四十七記載：“瀛國公名焘，度宗皇帝子也。”^⑥宋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駕崩，年僅三歲的趙焘在賈似道的扶持下登基，是為恭帝。南宋滅亡後，恭帝降元，忽必烈封其為瀛國公。趙焘以下都能夠入《宋史》本紀，但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以下卻不入《明史》，英祖對此提出了疑問。元仁孫回答說：“彼人書弘光以下事，名曰《三藩紀事》矣。”康熙年間的楊陸榮撰有《三藩紀事本末》一書，該書記載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等三個王朝事，但將南明諸帝視為“藩王”。英祖追問道：“然乎？”任瑋答曰：“《明紀編年》亦載弘光以下，彼人宜不可不書矣。”據此，英祖得出結論：“宜比帝顯輩矣”，認為《明史》應該比照《宋史》將恭帝納入本紀體例，將弘光帝以下納入《明史》。接著元仁孫說：“永曆入緬甸，被逐入山，為吳三桂所害，甚詳於《明季遺聞》矣。”清順治年間鄒漪創作的史書《明季遺聞》，記載有南明小朝廷隆武、永曆史事。英祖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感興趣，追問道：“其起頭始於何時乎？”元仁孫回答道“弘光事為首卷，此外又有《啟禎野乘》矣”，指出《明季遺聞》首卷記載南明朱由崧弘光政權歷史，這一點與我們今天所見的康熙年間刊本《明季遺聞》不太相符。康熙年間刊本有四卷：第一卷記載明朝末年李自成農民起義事；第二、三卷才是記載南明朱由崧弘光政權的興亡歷史；第四卷記載隆武、永曆繼立本末。為什麼會這樣？《明季遺聞》成書後因遭禁毀，長期是以抄本形式流傳，因此現存各個刊本、抄本等都內容各異、詳略不一，這裡元仁孫所說“弘光事為首卷”體例，倒是和道光年間刊行的《昭代叢書》本一致。《昭代叢書》本將卷一中記載李自成事全部刪去，將卷二、卷三記載弘光朝史事置前，這大概是當時的一種抄刻本即如此，元仁孫所見或也是這一類抄刻本。元仁孫還提到了《啟禎野乘》，這部史書也是鄒漪所著，卷首有錢謙益《序》，凡十六卷，主要記載明天啟、崇禎兩朝史事。英祖君臣言至此，都在議論晚明歷史與史書編纂問題，這時候任瑋開始轉換話題，說道：

瑋曰：“《明史》云：建文投火矣。”上曰：“御制則有緇衣字，儒臣亦不了然乎？”仁孫曰：“他書皆云‘生’，而《明史》獨稱‘崩’，臣見《曝書亭集·與總裁官書》，詳言建文之崩，

《明史》似用此言矣。”《曝書亭集》入，覽好矣。^⑦

由任瑋所言及的“建文投火”事，引出元仁孫介紹《曝書亭集》記載的“建文之崩”之事，於是英祖命人領出《曝書亭集》來，與群臣一起共讀。英祖與儒臣共讀《曝書亭集》的起因，直接的聚焦點在於“思明”，這與前揭李德懋、成海應等海東文士普遍關注並徵引《曝書亭集》中晚明遺民事蹟相呼應。

二、明事不分明：在《曝書亭集》中閱讀明史

建文帝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孫子，明朝第二位皇帝，在靖難之役後下落不明，據張廷玉總裁《明史》卷四《恭閔帝》記載：“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⑧其中並未稱建文帝“崩”。而萬斯同修撰的《明史》卷五《建文紀》謂：“宮中火發，帝及后馬氏崩，燕王發哀於龍江，以天子禮祭葬之。”^⑨明確記載朱允炆攜皇后馬氏，投入火中“崩”，朱棣從火堆裡扒出一具燒焦屍體來加以證明，並埋葬了建文帝，這也就是任瑋所說的“《明史》云：建文投火矣”。康熙十八年（1679）史館始編纂《明史》，徐元文與王鴻緒相繼任總裁，萬斯同負責編寫和修訂，朱彝尊亦參與其中。元仁孫認為《明史》中記載的觀點，似乎就是採用了朱彝尊《曝書亭集》中的說法。

《曝書亭集》卷三十二存朱彝尊《史館上總裁》七書，其中第四書“詳言建文之崩”事：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稿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稿，書法相違。彝尊愚聞，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下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⑩

朱彝尊參與撰寫《明史》的《建文帝本紀》，他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寫出了三卷稿，而同為出自秀水的史家徐嘉炎，字勝力，也纂成《建文帝紀》，朱彝尊認為徐《紀》與自己的書法不同，并列舉出十三“不足信”。在《曝書亭集》卷四十五《明史提綱跋》一文中，朱氏又說：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群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為然也。^⑪

朱彝尊主張“宮中火帝崩”，嚴遂成贊成朱氏之說，認為：“昔竹垞先生在史館有問遜國事宜何書，以‘宮中火帝崩’五字對，迄為定案。”^⑫元仁孫認為《明史》似用“宮中火帝崩”之言，於是君臣一起在《曝書亭集》中求證。

接下來，英祖與群臣開始一起品讀《曝書亭集》：“上曰：注書持去《自省編》，入《居易堂》、《曝書亭》兩集。臣晉圭承命入之。”英祖命人撤去御制《自省編》，請入《居易堂集》和《曝書亭集》。《居易堂集》是徐枋的文集，康熙間有刻本。徐枋，字昭法，號俟齋、秦餘山人，蘇州吳縣人，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入清不仕，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所以英祖組織這次讀書會，重點是要瞭解晚明遺民的明史書寫，於是假注書李晉圭請入《曝書亭集》，一起共讀：

上命仁孫讀《曝書亭集》論建文書。仁孫讀畢，達曰：“臣不知何書有之？成祖，實我

國女所誕出云矣。”上曰：“儒臣習熟明事，鄭貴妃事，知之乎？”仁孫曰：“嘗聞於臣父，忘之矣。”上曰：“注書出取《明史后妃》奏來。”臣晉圭承命持來，上命仁孫讀《馬后傳》，讀畢，達曰：“明事可觀者，有《明興雜記》、《弇山遺記》矣。”

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是誰？歷來頗有爭議，大致有五種說法：一是朱棣自稱是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嫡子；二是成祖與周王為高皇后所生，餘皆庶出；三是成祖為達妃子；四是成祖為碩妃子；五是成祖為元主妃所生。^⑬元仁孫所言“成祖，實我國女所誕出”，即是第四說“高麗碩妃”子，朱彝尊亦持此說，其《曝書亭集》卷四十四《南京太常寺志跋》云：

（《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為高麗碩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為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啟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碩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於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⑭

南京太廟奉先殿的奉先廟制以高后南面，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南京太常寺志》載成祖為碩妃所生，朱彝尊認為可信，而《實錄》所言反而是史臣的“曲筆”。英祖要求“儒臣習熟明事”，關於“鄭貴妃事”，元仁孫說他從其父親那裡聽說過。據黃景源《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元公墓表》載：“公諱仁孫，字子靜，原州人。輔國崇祿大夫兼禮曹判書，致仕奉朝賀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文公諱景夏之子。”^⑮元仁孫的父親元景夏也熟知明事，且閱讀過朱彝尊《曝書亭集》，並且給兒子講過此集：

上曰：“《曝書亭集》，儒臣曾見之乎？”仁孫曰：“嘗聞臣父之言，入玉堂後始見之矣。”

上曰：“太祖祖先之名，在《明史》乎？”仁孫曰：“太祖以上名字無傳，馬后之父亦不知名矣。”上曰：“明事不分明耶！”仁孫曰：“皇明則時代最近，而事蹟最不明，冊則多矣。”

英祖詢問儒臣們是否見過朱彝尊的《曝書亭集》，元仁孫說他的父親曾給他講過，但真正閱讀此集，是進入“玉堂”以後。玉堂，即弘文館，也稱玉署、瀛閣，是朝鮮的行政機關與研究機構，負責秘密圖書的管理、幫助王宮保管書庫。《曝書亭集》入藏朝鮮弘文館。英祖說《明史》沒有記載太祖祖先之名，元仁孫補充說，不僅沒有太祖祖先的傳記，馬皇后的父親也沒有列名，所以英祖感歎“明事不分明”。因此，朝鮮君臣在“明事不分明”的歷史語境中閱讀《曝書亭集》中的“明史斷片”，在《曝書亭集》中“分明明事”。

三、善文：品讀《謁孔林賦》

有意思的是，朝鮮英祖討論了這麼多《曝書亭集》中的內容，但對朱彝尊其人的認知甚少：

上覽《曝書亭集》初卷，仍教曰：“此是胡人耶？”仁孫曰：“皇明閣臣周國楨之孫，而仕於彼矣。”上命讀《謁孔林賦》，曰：“文則何如？”仁孫曰：“善文矣。”上命讀《居易堂集》自敘文，上曰：“薙髮乎？”仁孫曰：“不免而以父命不死矣。”上曰：“欲命弘文館粧緘入之，聞薙髮之言止之，其文則不歉然乎？”

英祖原以為朱彝尊是“胡人”，元仁孫回答說是“皇明閣臣周國楨之孫”，這或是記錄之誤。^⑯經查明代閣臣中，並無周國楨之名，疑為朱國楨之訛。朱國楨，字文寧，浙江烏程（今屬湖州）人，曾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但朱彝尊並非朱國楨之孫。在《明史》中，《朱國楨傳》是附於《朱國祚傳》之後的，^⑰而朱國祚才是朱彝尊的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1583）癸未科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後加太子太保，入文淵閣。朱國祚與朝鮮也頗有淵源，萬

曆二十年，“日本陷朝鮮”，朝臣沈惟敬懇兵部尚書石星奏請“封貢”，朱國祚指斥沈惟敬是“鄉曲無賴”，責問石星：“公獨不計辱國乎？”^⑧後明朝水軍聯合朝鮮擊敗侵朝日軍。因此朝鮮人對朱國祚應該是熟悉的。英祖在這裡認知到：朱彝尊是漢人，並非滿人，且其祖上曾有功於朝鮮，這蓋是《曝書亭集》得以入藏弘文館的原因之一。

其次則是因為朱彝尊為賦“善文”。英祖“覽《曝書亭集》初卷”，而此集卷一是“賦”類，存賦八篇：《謁孔林賦》、《春蒐賦》、《太極圖賦》、《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省方賦》、《湘湖賦》、《水木明瑟園賦（並序）》、《携李賦（並序）》。英祖與群臣一起品讀《謁孔林賦》，此賦載《曝書亭集》卷一“賦”首篇，彙錄如下：

粵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也，杏壇花繁，庭檜甲坼。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辟。既釋菜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牽車魯城之北，縶馬洙水之陽。即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祔兮居前，聖子藏兮在左。自黃玉之封緘，闕幽宮而密鎖。隕長鯨兮不驚，懾祖龍兮遠禍。除荊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墮。雨露既濡，遲景東隅。整衣裳之肅肅，正顏色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跡。超百兔之深溝，撫青羊之臥石。爰有草也，苞著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莖，我求其德，洵圓且靈。爰有木也，題之以楷，非柏非樅，靡癭靡廔，歷千禩而長新，貫四時而不改。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於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天後天之《易》。目鄭衛以淫邪，誣《春秋》以深刻。藐往哲之嘉謨，恒末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恥同污俗。或六聘而收身，或三詔而逃祿；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穀。潛戶壁於服虔，變姓名於梅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遷。可遊可息，有歌有弦。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睹旗鼓之樓船。樂土樂土，速營一廬。願為林戶，躬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不得為聖人之徒也與？

元仁孫對朱彝尊的評價是“善文”，就《謁孔林賦》而言，朱彝尊如何“善文”？一是“清新可詠”的景物描寫。黃昏時分，新雨剛過，“雨露既濡，遲景東隅”，在夕陽的餘暉下，朱彝尊整衣正色，走過文津橋，穿過長春坊，超深溝，撫臥石，贊蒼草，拜楷樹，一路寫來，這種寫法不同於以往的謁孔林之作，誠如胡大雷先生所謂：“一般寫到‘謁孔林’這類題材，免不了是對孔丘多作頌揚，且長篇累牘闡揚儒家那些呆板陳腐的大道理，本賦未落入這樣的俗套之中，而是寫自己的所作、所見、所感，簡捷明快，清新可詠。”^⑨二是源自於賦中的“羹牆之思”。朱彝尊在《謁孔林賦》中批評“後儒”附加在《六經》上的種種異端之說，篡改聖人本意，以致妄說橫行，不符合聖人之道，因此力主恢復《六經》的本真面貌。朱彝尊門人張大受著有《書竹垞先生手書謁孔林賦後》一文，有曰：

秀水朱先生……嘗謁孔林，著為賦，有羹牆之思，至云：“降而後儒……恒末師之是則。”何其言之慨然有憂也？前之聖人已往，不能復起，而與天下亂道者親折，其非《詩》《書》《易》《禮》《春秋》之文，乃為後人飾其外以裂其裡，一師之學興，群妖叢其側以貽禍於天下。然則先生之逆料夫道之衰之必至於此，而於聖人之居，瞻望而憂思者，誠非得已也。^⑩

作為弟子，張大受深切地感受到了朱彝尊的“憂思”。通過拜謁孔林，瞻望聖人之居，朱彝尊期望聖人之道復起，故亟需改變目前經學研究的現狀，預流此後乾嘉漢學興起，誠如張宗友先生所云“乾嘉學風以徵實、考據見長，朱彝尊以其實績而具導源之功”。^⑪三是尊《六經》、垂“聖教”的主旨。

朱彝尊遵循儒家道統，以為“道莫著乎《六經》”，張大受在《書竹垞先生手書謁孔林賦後》又云：

先生書此賦不兩月，遂逝。以垂沒之日而瞻闕里，尊《六經》，孜孜不已，誘掖後進好學之士。先生既沒，而斯文無所折中，豈獨及門弟子之傷？天下之道之衰而復振，其將誰望也與？^②

張大受認為朱彝尊“垂沒之日而瞻闕里”，這是對聖教的追尋；在去世前兩月書寫《謁孔林賦》，這是對《六經》的尊崇。據《朱彝尊年譜》：朱氏是在康熙八年，四十一歲時拜謁孔林，寫作此賦；康熙四十八年，八十一歲卒。^③垂暮之年的朱彝尊書寫四十年前的一篇賦作，追尋聖道，孜孜不已。

最後，朱氏能賦與英祖注重以辭賦取士的主張一致。在《承政院日記》中，經常看到君臣討論辭賦取士問題，在仁祖九年（1631）討論科舉弊端時，“議者以為，生員試，試以賦辭，則可除其弊。故相李德馨亦云：‘分試以賦辭好矣。’上曰：‘……似為有益，令禮官議啓。’”^④賦一直是朝鮮科考中的重要文體。英祖二年，“今丙午年……文科初試額數三百人，依前例……初場論賦，終場策問，一道講經……”，^⑤依照前例，科場試賦取士；在英祖十二年，左議政金在魯提出“今日士子，宜乎遍習諸般文字，而所謂賦者，極為腐陳”的論調，英祖反問道：“雖出賦，而京儒亦多為之，何也？”^⑥又在十五年，英祖說：“咸聚京師，有意出賦，則京儒裹襖，揭表則鄉士不參，予嘗聞儒生稱冤之說，故時出此等題矣。”^⑦又十七年，英祖說：“李成中，以‘郁郁文哉’賦題登科，而觀其文，可知其人。”^⑧考試不僅能夠平議京儒與鄉儒之爭議，還能以賦擇人，考見才學。在科舉上是否要實行面試，面臨“以文擇人”與“為人擇文”的爭議時，英祖特發教旨：“凡科場為文擇人，而若窺封科次，是為人擇文也，此公平、私乎？此後試官犯此者，施以科場用情之律。”^⑨平議紛爭，繼續維護“以文擇人”的主張。

朱彝尊因為是“明閣臣”之後，能賦“善文”，推尊《六經》，為文而能見才學品性，主張“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成聖人之徒，這些都是其《曝書亭集》入藏朝鮮弘文館的重要原因。相反，徐枋的《居易堂集》因有“薙髮”之言，其文“歉然”，故不得入弘文館。

四、餘論：朱彝尊與海東文士的互望

朱彝尊賦有大才，學問取法高尚，知識視域開闊，尤其是頗為留心於海東之學。在他的《曝書亭集》中，關於其閱讀朝鮮的書籍，卷四十四有《書〈高麗史〉後》、《又書〈高麗史〉後》、《書〈海東諸國紀〉後》、卷五十二有《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

明景泰二年（1451），朝鮮使臣鄭麟趾攜其所撰《高麗史》至北京，並贈送明王朝。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六載：“考《明實錄》，景泰二年，高麗使臣鄭麟趾嘗表進是書於朝。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題跋。”^⑩朱彝尊閱讀《高麗史》並題有二跋，其一謂“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稱其中史事，有“《元史》之所不載”者，又有“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者，因此“藉其史，略存事蹟，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其二以方孝孺為例，因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沒其實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對比鄭麟趾等撰寫《高麗史》記載李成桂事，則直書其事，朱彝尊不由感歎道：“是下國之史官，勝於楊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⑪朝鮮成宗二年（1471）申叔舟編纂成《海東諸國紀》，是其以朝鮮對日使臣書信官的身份訪問日本，主要記載日本及琉球的歷史、地理、政治、語言等文獻。朱彝尊在《書〈海東諸國紀〉後》一文中謂“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自周至於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海遺書》”，^⑫肯定此書的歷史價值。《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一文，是朱彝尊為高麗權近（1352～1409）的《應制集》所寫的跋。權近，字思叔，別字

陽村，是朝鮮王朝初期權臣、理學大家。他在洪武中至南京，朱元璋優禮待之，並賜衣賜食，“爰命賦詩”而結集成冊，但“陽村賜遊酒樓，《實錄》未之載，予所見《應制集》，則天順元年朝鮮本也”，^③此可補《明實錄》之闕載。

除了閱讀朝鮮書籍外，朱彝尊還閱讀有日本史籍，《曝書亭集》卷四十四有《跋〈吾妻鏡〉》一文。《吾妻鏡》，一名《東鑒》，記載日本國志的歷史著作。關於這本書的歷史價值，朱彝尊認為：“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鑒》、《史略》諸書，多可考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裔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④中州所見高麗史著已有不少，但日本史不多，尤其是在寫到國王授受次第時，多不太明晰。朱彝尊認為《吾妻鏡》可補此一缺憾，且可與《海東諸國紀》合讀，歷史價值甚高。所以朱氏很看重此書，在康熙三年（1664）就“獲睹是書於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三年，乃歸插架”，還歎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⑤

朱彝尊的海東書籍閱讀，得到了朝鮮文士的積極回應。首先是充分肯定朱彝尊的史學成就，李圭景評說歷代史籍時說：“清朱竹垞彝尊，以檢討被命，纂修《明史》，有上總裁七書，最為詳贍。……又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此是朱竹垞纂史之正論。後之修史者，潛心效法。”^⑥尊朱彝尊為修史者的典範。所以他在“二十三代史及東國正史辨證說”中評論“鄭麟趾《高麗史》”時，便引用朱彝尊《書〈高麗史〉後》全文；又在“外國琉球、日本、安南、回部等國史記事辨證”中引用朱彝尊《跋〈吾妻鏡〉》全文；最後還在“東國全史重刊辨證說”中說：

史者，國之鑒也，彰往啓來。憲古證今，惟有史也。中原則歷代有全史，我東則闕焉。

雖曰文獻無征，亦不可廢也。近世朱竹垞彝尊《書高麗史後》，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世之文獻有足徵者。又題《海東諸國記後》，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鑒》，有《史略》，蓋表而彰之也。我東史策之巨，無有如《麗史》者。而中國名儒，稱其有例，則可謂良史也。^⑦

正是由於朱彝尊對海東國史的關注，讓海東學人倍感榮耀；而能得到“中國名儒”如朱彝尊者的讚譽，則是成為“良史”的一個標誌。他如李裕元在其《林下筆記》中也全文徵引《書〈高麗史〉後》、《跋〈吾妻鏡〉》等。韓致齋編纂《海東繹史》除了徵引《曝書亭集》中的《書〈高麗史〉後》、《又書〈高麗史〉後》、《書〈海東諸國紀〉後》、《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諸文外，還廣引朱彝尊其他著述中的涉海東文獻，如著錄權近《入學圖說》云“《高麗史》，權近字思叔，辛禡時，左司議大夫，著《入學圖說》，謂出自“《經義考》”；著錄申叔舟《汎翁集》云“申叔舟字汎翁，積官至領議政，以功封高靈君，有《汎翁集》，謂出自“《明詩綜》”；介紹申叔舟及其《詩集》時云“成化七年十二月，奉國令撰《海東諸國紀》，書成，作序紀書日本代序及八道六十六州，頗詳”、“所著《詩集》二十卷，孫從濩編，寧都董尚書越使其國為作序”，謂出自“《靜志居詩話》”。^⑧

朱彝尊閱讀海東史籍，遙望海東學術；海東文士在閱讀朱彝尊的撰述時，不僅論史品文，還回望朱氏對於自己國人典籍的評鑒，並以此作為權威徵引。二者在閱讀的互望中，不僅拓展了朝鮮文士的知識和學術視野，也豐富了朱彝尊撰述的東亞閱讀史，彰顯著朱氏的豐贍學識和巨大的海外影響力。

①參見朱則傑：《〈清人別集總目〉考論——以朱彝尊

1期。

為主線》，浙江寧波：《寧波大學學報》，2003年第

②林大椿：《林大椿集》，北京：線裝書局，2013年，第

65 頁。

③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2005 年，第 258 冊，第 68~540 頁。

④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74 冊，第 303 頁。

⑤申緯：《警修堂全稿》貳錄三，《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91 冊，第 115 頁。

⑥脫脫等：《宋史》卷四十七《本紀》第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921 頁。

⑦朝鮮《承政院日記》重印本，第 1127 卷，英祖三十二年 1 月 17 日，第 100b 頁。

⑧張廷玉等：《明史》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6 頁。

⑨萬斯同：《明史》卷五《建文紀》，清鈔本。又王鴻緒撰《明史稿》卷四《建文帝紀》也云：“宮中火發，帝及皇后馬氏崩，燕王發哀於龍江，以天子禮葬祭。”清雍正元年敬慎堂刻本，第 8a 頁。

⑩⑪⑭⑮⑯⑰⑱朱彝尊：《曝書亭集》，上海：世界書局，1937 年，第 404 頁；第 549 頁；第 541 頁；第 537 頁；第 537 頁；第 619 頁；第 538 頁；第 538 頁。

⑫嚴遂成：《明史雜詠》卷二，清乾隆刻本，第 7b 頁。

⑬參見吳晗：《明成祖生母考》，北平：《清華學報》，1935 年第 3 期。

⑭黃景源：《江漢集》卷二十，《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224 冊，第 417 頁。

⑮按：𠂔=朱，𠂔=周，在韓國文字中朱和周是同一個字。

⑯⑰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第 6249~6251 頁；第 6249 頁。

⑱王筱雲、韋風娟等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分類集成 散文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 年，第 117~118 頁。

⑲⑳張大受：《匠門書屋文集》，見《四庫未收書輯刊》

第 8 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24 冊，第 736 頁。

㉑張宗友：《尺牘·事行·思想：朱彝尊研究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 年，第 256 頁。

㉒張宗友：《朱彝尊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第 166、557 頁。

㉓朝鮮《承政院日記》重印本，第 34 卷，仁祖九年 11 月 8 日，第 124a 頁。

㉔朝鮮《承政院日記》重印本，第 628 卷，英祖二年 12 月 4 日，第 30b 頁。

㉕朝鮮《承政院日記》重印本，第 816 卷，英祖十二年 1 月 15 日，第 93b 頁。

㉖朝鮮《承政院日記》重印本，第 889 卷，英祖十五年 4 月 28 日，第 148b 頁。

㉗朝鮮《承政院日記》重印本，第 889 卷，英祖十五年 4 月 28 日，第 89a 頁。

㉘《朝鮮英祖實錄》卷七一，英祖二十六年二月丁亥，首爾：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年，第 43 冊，第 363 頁。

㉙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590 頁。

㉚㉛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之《經史篇》史籍類，首爾：東國文化社，1959 年，第 1032 頁；第 1042 頁。

㉜韓致堉：《海東繹史》四十三《藝文志》二“經籍”二，《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1433 冊，第 22~28 頁。

作者簡介：王思豪，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桑海]